

韩志华 著

中西文化交流程度研究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西文化交流程度研究

韩志华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文化交流程度研究 / 韩志华著. —北京: 中国
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078-4014-8

I. ①中… II. ①韩… III. ①文化交流—文化史—研
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3308 号

中西文化交流程度研究

著 者 韩志华
责任编辑 笄学婧
装帧设计 于丹丹
责任校对 有 森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010-83139469 010-83139489 (传真)]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 2 号北院 A 座一层
邮编: 100055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68 千字
印 张 20.5
版 次 2017 年 5 月 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2.00 元

绪 论	1
0.1 选题意义	1
0.2 课题概念体系及解题思路	2
0.3 研究者场域	17
0.4 研究的道德伦理	20
0.5 课题基本结构	21
第一章 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综述	23
1.1 中西文化交流中相关问题	23
1.2 中西文化交流学科及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29
1.3 研究方法综述	44
第二章 中西文化交流失度问题一：交流不足	50
2.1 绝对交流不足	50
2.2 相对交流不足	56
2.3 交流不足原因解析	71
第三章 中西文化交流失度问题二：过度交流	85
3.1 何为“过度交流”？	87
3.2 “过度交流”表现	88
3.3 “过度交流”中的文化问题	127
第四章 中西文化交流程度核定依据	129
4.1 西方文化中“天”概念	131

4.2	中国文化中“天”概念	148
4.3	中西文化结构性差异作为中西文化交流核定依据的可能性 ...	171
第五章 中西文化交流变量研究		174
5.1	变量研究一：母体文化宏观流变	174
5.2	变量研究二：交流因素群变量分析	185
5.3	变量研究三：目的文化作为变量	220
5.4	结语	241
第六章 中西文化适度交流模式探索		243
6.1	“适度交流”简述	243
6.2	适度交流模式简述	260
6.3	文化弹性与中西文化可持续性交流	282
部分参考书目		291
中文书目		291
外文书目		313

绪 论

0.1 选题意义

文化交流与文化的自我衍变促成世界之变。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论为人类编织了由低到高的单行线型发展思维。实际上，“崇我抑外、贵今贱古”是时空造成的“障眼法”。受时空所限，人们很难得观文化的本真形态与全貌，宛若通天塔倒塌后零散的人类语言，盲人摸象，各有所见。中西文化，既非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吟叹的“东即为东，西即为西，两者永不交汇”，又非麦克奈尔（W.N.Mcneill）所认为的东西同源，而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同样的地球与人类，相异的地理气候环境使得中西文化既同又异，由此促成了中西文化交流之可能。同，是文化间进行对话的平台；异，则是文化交流的必要前提。因而，“同”与“异”间的比例关系就成为重要问题。中西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同，在什么层面上必须保持相异，是本课题的中心议题，也即中西文化交流的程度问题。

在中西交流不断拓展与深入的今天，中西文化交流程度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历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无不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全球化世界网络中，避世隔绝已然不可能，而中西文化几乎覆盖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及国家，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纵观中国近 200 年历史，从中西初识到明清西学大兴、清民之际西方入侵和中西论争，直至新中国独立及改革开放，中国学术、思想、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均发生了巨变。诚然，历史本身自有其发展轨迹，文化形态变迁亦不能完全归咎于外因；但正是文化自身传统与外部环境吸收、抵抗、反击等有机互动，才成就文化的复杂性。

其次，从学理上说，万事万物同源互补，物物之间的差异可归结为程度差异，如总体上说中国文化重德，西方文化重智。其实，中国文化也重智，只是重德的程度更高。因而，中西文化交流程度研究对于进一步认清中西文化间的差异并厘清以往交流中存在的问题意义重大。

第三,从中国文化本身来说,现今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然发生了巨变,传统的农业型社会结构在工业化进程中,深受影响,并不断地进行自身的调适与改变。在社会因素群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变迁、社会组织结构变化如城镇化进程、人口流动等均促成文化渐变,并不断冲击着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要保存传统文化结构,多大程度上进行结构性调整,吸收西方文化中适宜的部分,以助益中国文化自身发展,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面临的重大课题。

最后,从中西文化交流领域的研究现状来说,以程度视角切入,梳理、分析并解决整个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失度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尚属空白。而且,如何处理好中西文化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自身更新的关键性课题。显然,以上诸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以下几方面:中西交流史梳理、中西文化比较与分析、交流过程还原及文化本体理论系统的构建等。因而,中西文化交流程度研究不仅要通过对交流史剔梳爬抉,为盲目交流正本清源,更着意于探索适宜的交流模式与原则,以指导未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发展。

0.2 课题概念体系及解题思路

论及异域稀罕物件、旅行见闻或人员来往,史官皆有载,如《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中载“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①”。除此之外,出土文物、遗址或实地民风走访调查资料等文献记述的经历、见闻、札记等从根本上来讲都是文化交流体系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它们是文化交流活动的见证。课题中“中西文化交流”是指中西直接接触式的交流,经由他族的间接交流之例虽不胜枚举,拘于篇幅所限,暂不作讨论。

0.2.1 何为“中西文化交流”?

0.2.1.1 “中”“西”之界定

一般地,中国文化身份表征及表意范围较为确定,即发端于黄河流域一带的中华文化,即区别于外来文化的“我们自己的文化”,是中国人或中国民族的生活方式、公共人生。从结构上来说,中国文化呈现出汉文化为主体

① 转引自马祖毅,《中国翻译史》,汉口: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页。

的多元一体文化形态^①。

但对“西”的界定在各类文献中向来表述不一。张星烺先生认为“西”涵盖了自上古之世的西王母之邦到大宛、康居、大夏、安息、天竺、大秦诸国^②。石田幹之助（いしだ みきのすけ）将“西”指为中国西部的世界^③，兼含希罗文化与伊斯兰世界文化，秦汉后，“西”侧重指大秦国即古罗马文化。方豪先生则认为“西”字所指与中国疆域的渐变关联紧密，今日之“西”意为欧美^④。向达先生的《中西交通史》则主要考察“中国同欧洲诸国的交通情形^⑤”。简括来说，在古代中西交通史中，“西”多指西域，但具体指代范围是动态的。从“最早的帕米尔高原东西两侧的中亚地区”发展到包括“南亚次大陆、西亚的波斯、地中海的东罗马帝国以及西南亚的非洲东海岸”，到明清时，“西”又拓展至欧西，并呼以“泰西”“远西”进行区分。就近代以来的形势而言，部分“西”已融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西域；部分则独立形成混融型文化，如中亚地区等。换句话说，在文化层面上，很难实行“一刀切”。因此，缩小区域成为明确研究对象的必要条件，“缩小研究区域，划定区域，如专讲中英交通史、中法交通史、中印交通史等，则界限既定，申述亦更能详明^⑥”。本研究中的“西方文化”指与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一脉相承的欧美文化及其影响下的诸文化形态。

0.2.1.2 “文化”与“文明”

“文化”概念不下数百种，但每种都只能代表其中的一个方面。同时，概念的变迁也体现出人类对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化。

文化，从发生学角度说，是指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物质成果的总和，它包括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⑦。从此定义可知文化无所不包，且文化创生于人和环境的互动，而文化之所以为文

① 费孝通，《文化和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②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页。

③ 石田幹之助 [日]，《中西文化之交流》，张宏英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1页。

④ 方豪，《中西交通史》（导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页。

⑤ 向达，《中西交通史》（序论），昆明：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1页。

⑥ 方豪，《中西交通史》（导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页。

⑦ 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

化的意义在于“人的改造和理解”。人是文化产生的根本性因素，文化的人类性是文化的根本属性。

从语义学角度说，“文化”一词在中国文化框架中，意为“文治教化^①”。《辞源》中解释“文”字意为“花纹、错画”“字、字形”，兼指礼乐制度、法令条文、美善之意，与“武”相对。“化”表示“教行、教化^②”；《辞源》释义“化”为“生、造化、习俗风气^③”。《周易·贲·彖传》中载“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注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是说圣人通过著书立说以语言文字规约社会秩序和人的言行，社会等级中从君主贵族到普通民众，概莫能外；后教化的对象又扩展至周边少数民族。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中载“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④”。可见，在中国传统中，“文化”指通过圣人立言及礼乐典章制度对人进行教育与感化。在现今语汇中，“文化”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⑤。

相对来说，西方语境中的“文化”则反映出法语、拉丁语、英语及德语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和语义变迁。“文化”（culture）源自拉丁文 *cultūra*，本意指“耕耘、栽培、培育”，后引申为“教育、修养、雅致、崇拜、尊敬、敬仰^⑥”之意。西塞罗（Cicero）的 *cultura animi philosophia*（哲学是对心灵的教化）中明确了 *cultura* 的“教化”之意。根据《法兰西学院词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的解释，“文化”（culture）一词“12世纪时作‘colture’，意为‘翻耕土地’；15世纪时意为‘荣誉行为’；到17世纪，则表示‘由教育而塑造成的精神’”。另外，词典中还注明此词同古拉丁语词汇“*cultura*”，意为“农业、精神文化、崇拜”或“*cultum*（耕地）”，德语“Kultur（文化）”及英语的“culture（文化）”。简单来讲，该词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含义，自然生产，即通过劳动的方法进行牲畜养殖或

① 《辞源》（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83页。

②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66页。

③ 《辞源》（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5页。

④ 刘向〔汉〕，《说苑》（说苑卷十五），四部丛刊景明钞本。

⑤ 《辞源》（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83页。

⑥ Glare, P.G.W. *Oxford Latin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66.

自然耕作；关于人的精神的提高以及关于精神产品及价值^①。

根据学者刘禾 (Lydia H. Liu) 考证，在现代汉语中，“文化”一词源于日语词“bunka^②”，也正是通过日语的假借实现了汉语的“文化”与英语的 culture (法语 culture, 德语 die Kultur) 之间的对接。古代汉语中，“文化”是相对于“武功”或“军事威力”来讲的，而经过翻译，完成了自身意义的西方化，表示“精致的状态 (state of refinement) 或艺术教养 (artistic cultivation)”“文化”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变化^③。可以说，词义是“经过日本人的改造已经成为日语的词汇成员，而汉族人民则是把这些已经成为日语词汇成员的日语外来词，再度吸收到汉语里来，把它们改造成现代汉语的外来词^④”。

另外，“文化”与“文明”是一对较易混淆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明”意为“文采光明^⑤”，《易·乾》中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⑥”。《辞源》释为“文采光明，文德辉耀以及与‘野蛮’相对的有文化的状态^⑦”。可见，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文明”与“文化”都是针对人文教化与社会风气来说的，都指文教昌明，与军事、武力、野蛮相对。从人所扮演的角色来看，两个词都强调自然化成，并未突出人对环境或自身进行改造的外力作用。

西方系统中的“文明” (civilisation) 源于 civiliser，意为“使被诉讼的罪犯社会化，有教养^⑧”。根据《法语文化词典》 (*Dictionnaire Culturel en Langue Française*) 释义，“civilization”一词在 18 世纪中期表“公民的法律 (juridique de civil)”，之后表“开化、文明 (civilisé)”并发展为“进化、

① ——.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Neuvième édition) (Tome 1)*.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92. P559-560.

② Liu, H. Lydia.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3.

③ Liu, H. Lydia.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3.

④ 高名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年，第 80 页。

⑤ 孔颖达 [唐]，《周易正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年，第 58 页。

⑥ 王弼 [三国]，《周易》(卷一)，四部丛刊景宋本。

⑦ 《辞源》(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1485 页。

⑧ ——.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Neuvième édition) (Tome 1)*.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92. P400.

进步、演化^①”之意。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大约在 1732 年，civilisation 还仅仅是法律用语：指称一种正义行为，或一种对刑事犯罪进行民事（civil）诉讼的审判^②”。到 1760 年，civilisation 已经含有“社会宗教、道德、审美、科学、技术现象的总和之意；与 culture 相比，civilisation 更侧重于促进社会的智力或道德因素”；而到 1767 年，civilisation 已然与“原始、野蛮”相互对立了。“因此，文明大概算是传教士殖民主义的基本幻觉（la civilisation serait alors fantôme fondateur du colonialisme missionnaire.）^③”。

黄兴涛先生认为，现代汉字“文明”概念的核心词汇符号可能产生于明治维新初期的日本，而在中国，黄遵宪最早用“文明”来表“开化”之意，但他在书中并未区分“文明”与“文化”，因为此二词，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往往混用，意义上并无明显差别。最早用“文化”来对译“civilization”始于 1882 年中国人颜永京和 1883 年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W.A.P. Martin），他们留下了戊戌前西方概念在华传播的直接印记^④。

由上可知，文化与文明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强调社会道德风尚教化与政治清明。而在西方文化语义范畴内，“文明（civilisation）”表示驯化罪犯，含进化论的等级观念，具有对全世界进行“层级划分”的语汇内涵。“文化（culture）”则重于人对物的改变，如耕作土地、驯养动物、提升个人，并以此为社会道德标识，完成“公民化”“城市化”的驯养过程。显然，现代汉语“文化”一词释义中的“区分性”意义是翻译带来的“文化操纵（manipulation）”与“文化阐释（interpretation）”，并逐渐影响了词义表达的内在精神，即由教化社会道德转向人对自身、对世界的主动改造。这样一来，文化就由注重内在价值包括人的劳动、精神及物质产品转向注重外在性的认定，即合法性问题和层级递进关系，体现出“文明”的诱导暗示作用，从而使“文化”具有价值判断意味、“高级”与“野蛮”之分。从“公民社会”意义上说，制度越完备，越符合“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要求，

① Morvan, Danièle. *Dictionnaire Culturel en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Dictionnaires Le Robert. 2005. P1579-1580.

② 费尔南·布罗代尔 [法]，《文明史纲》（*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肖昶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3 页。

③ Morvan, Danièle. *Dictionnaire Culturel en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Dictionnaires Le Robert. 2005. P1580.

④ 黄兴涛，《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51-152 页。

则越“文明”。显然,“文明”“公民”(polites^①)和“公民社会^②”本身具有了明确的阶级性和排外性,成为用来区分人群等级并确立社会制度和道德法度的合法性依据。所以,“文化(culture)”一词所包含的对原始状态的开发、加工和提高的语义变迁体现了人对自然、对动物及对自身的驯化过程,是人的某种意志的体现。同时,也反映出人类对于原始状态的背离和对人治的诉求,其政治色彩虽较弱些,却蕴含了借由外力而获改变之意,甚至布罗代尔认为文化是文明的初始阶段^③。显然,西文中的“文化”与“文明”与汉语“文化”中所包含的“文治教化”“政治清明”之意相去甚远;而在现代汉语和现代社会中,中国语境下“文化”的本体意义显然已经处于语义边缘化与失声状态。

0.2.1.3 “交流”与“交通”

从词语本体意义上说,对中西文化间互通有无情形的描述,“交通”比“交流”更为确切。“交通”表互相通达、交往^④，“通”本身即含“交换、往来交好^⑤”之意。而“交流”在《辞源》中尚无此词条,《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词条释义提到了双方的供给关系^⑥。尽管如此,随着“交通”一词意义的不断丰富,“交流”反而更常用。在中西文化互动中,有时“交流”表示交流结果即文化间的影响,如石田干之助的“交流”^⑦;有时则描述交流过程如方豪先生将“交通”释义为“关系^⑧”。

从内容方面说,凡属中西间互动都可算作“交流”或“交通”范畴。这便涉及到伦理问题,即若将“战争”列入交流内容,是否用“交流”的积极意义和表达方式遮盖了战争的反人类性,从而使战争具有合法化资格?从历史记述看,一定意义上战争促进了文化间的交流和成果的传播。751年怛罗斯之战为阿拉伯送去了中国的造纸术,并随后传入西班牙、埃及等地,

① 希腊语作πολίτης,意为“citizen”。

②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6-117页。

③ 费尔南·布罗代尔[法],《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社,1992年,第115页。

④ 《辞源》(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5页。

⑤ 《辞源》(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339-3340页。

⑥ 笔者按:“交流”一词的释义为“交错地流淌;彼此把自己有的供给对方”,请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967页。

⑦ 石田干之助[日],《中西文化之交流》,张宏英译,商务印书馆,第1页。

⑧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页。

进而改写了世界历史；而著写旅行日记的首个中国人杜环以战俘身份到了阿拉伯世界，并留下关于“中国人观西方”的文献。另一方面，从人类性角度来说，冷兵器时代依靠人力及排兵布阵谋略，进行“溃”即为止的战争不但是文化交流方式，甚至堪为战争艺术，如《孙子兵法》。而反人类性战争，一方面指对战败方屠城，另一方面更侧重于热兵器时代及工具、信息科技化的战争方式。这种战争以灭绝人类、毒害人体或环境为代价，如生物战、化学战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等。因而，战争是特殊的交流形式。

0.2.2 解题脉络梳理

0.2.2.1 解题节点之一：“程度”界说

现代汉语中，“程度”指能力水平和事物变化达到的状况^①；古代汉语中，“程度”除表示“能力水平”外，还指“期限、进度；格式标准^②”。就本课题来说，所谓“事物变化达到的状况”是指中西文化的交流情形及文化变化状况；“期限、进度”指两种文化的交流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格式标准”指“适宜”的交流程度或交流模式。因此，中西文化交流程度研究包含交流过程的描述、文化变化和交流限度的考察及适宜交流程度的探索。

从字面意义上来说，程度并非量性的规定，比如 60 单位或 100 单位的量化尺度，但量性的区分往往产生质性差别，如分级考试中 60 分与 59 分以及 H₂O 的三种形态，都与量相关。同样，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量变与质变之间的确存在质性转化的瞬间，辜正坤先生将之命名为“程度临界值^③”。康德在《纯粹理智考察》（*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提到，一方面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另一方面，人的认知能力也有局限性^④。而这两方面的有限性决定了一切研究归根结底都只是程度研究，即在某种程度上某种结论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2 年，第 253 页。

② 《辞源》（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2519 页。

③ 辜正坤，“辞典编撰原则：惟变所适与规约守成论——序孙迎春教授《译学词典论》”，引自孙迎春，《译学词典论》（序言），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7-8 页。

④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Guyer, Paul & Wood, Allen W. (translated and edi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99, 127, 128, 132, 151, 159, 163.

可适用性或某种关系得以建立的可论证性，“没有一劳永逸的研究^①”。就中西文化交流课题言，程度研究与其说是建立评价系统的尝试，不如说是对交流样态的剖析。换言之，程度是一种状态，一个过程，而并非具体的数值或刻度。因此，中西文化交流程度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分析与评估中西文化交流样态。

在进行程度评估前，应该从道义层面拷问文化交流活动的合理性问题，即该不该交流。大体说来，中西文化交流首先要分成两类：过度交流与非过度交流。非过度交流指符合基本道义的交流行为，非侵略、威慑人类或他种文化安全的交流，而过度交流显然指不该发生的交流。

在非过度交流范畴内，逻辑上说，程度又可分成两种情形：适度与失度。显然，适度是程度的理想状态、健康态；失度则为病态，大体包括不足与过度两种。通常地，交流不足指两种文化间没有交流、低频率交流以及低质量交流或交流不充分的状况。交流过度则通过交流结果反应出来。究竟文化状态的改变是否必然意味着交流过度，需要从长期的文化传统与呈现来判断。一般来说，文化改变的周期较长，且文化具有自我调适的能力，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相对来说，交流过度常表现为文化同质化，即自我文化身份或文化活性的消失，也可理解其为文化的碎片化、断根化。

适度文化交流是文化交流及文化自身存在的理想状态。一方面，中西文化充分了解自身及对方，最大限度地消除因误读带来的误解和误会；另一方面，中西文化在自我文化主体意识的干预下对交流过程进行适当干预，有利于克服盲目交流而导致的文化侵占、文化替代等过度交流和交流过度；同时，文化主体意识在恢复文化自信的同时也保存了自身的文化弹性，是中西文化开展可持续性交流的有效保障。因而，本文认为，在交流中，合而不融、拼合互补是文化相遇时的文化尊重和互相保全的基本原则；而和而不同、互体互用则是在文化主体意识作用下进行自觉交流的重要保障。在本文看来，适度交流模式的基本原则是“合而不融、拼合互补；和而不同、互体互用”。

0.2.2.2 解题节点之二：标准与中枢

A. 文化交流失度厘定标准——“以人为本”

以“程度”为切入点中西文化交流过程进行梳理和评估，首要问题

① 辜正坤，“辞典编撰原则：惟变所适与规约守成论——序孙迎春教授《译学词典论》”，引自孙迎春，《译学词典论》（序言），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是评估的依据和标准问题，同时，这也涉及到判定文化事件的基本立场。从文化本体来说，文化的产生源自“人与自然的互动”；因此，“最美好的文化代表着一种最美好的人性，最美好的人性是最美好的文化塑造出来的^①”。而“最美好的人性”首先要尊重人的生命，“文化的最核心的东西是足以代表最美好的德性的价值观（例如克己与礼让等等），而不是飞机大炮或原子弹^②”；其次，美好的文化要尊重人的自然生育以及生育制度所带来的亲属关系等，并由此推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关系群。相反，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个体的文化形态则是反人性的，是对人与人之间最天然联系的背离。因而，本文对文化及文化事件的基本判定标准是“以人为本”。

这一提法本身在中西文化语境中需要加以区分。

“以人为本”在中国哲学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以人为本”多指“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谋略，如《管子》《三国志》《全唐文》《旧唐书》等，“人”多指“民心”。其次，孔子在《灾异论》中指出“以人为本”解释了人为天地自然万物之灵，且天地自然灾异现象如同人之病气，意在提醒治国者修政道得安泰。因而圣人多记述灾异而非祥瑞，以“惧其君骄故也”；楼宇烈先生称之为“由天道明人道，用人道弘天道”，是中国真正的天人合一^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谱系里，自然以异常之状警喻人世，人世则须厚德载物，以配天德。显然，人世指人类社会群体。

西方社会中，“以人为本”常常表述为“人文主义”，其内涵与中国文化中的“以人为本”具有根本性的差异。据《不列颠大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词条解释，“人文主义（humanism）”强调人类世界的多种信仰、方法及哲学，其核心是“人性”（*humanitas*）。起源上说，“人文主义”指13、14世纪兴起于意大利北部并随后风靡欧陆及英国的一套教育和思维方式（*mode of inquiry*）系统，并由此开启西方社会的新纪元——文艺复兴时期，也被称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Renaissance humanism*）”，旨在根本性地复兴（*renewal*）和唤醒（*reawakening*）人的最大潜力，并将个人“人性（*humanitas*）”国家化，即把个人的“德性（*virtue*）”拓展至民族甚至世界的整体“人性”与道德标准。

① 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4页。

② 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4页。

③ 楼宇烈，“最可怕是文化上沦为殖民地”，《楼宇烈教授访谈录》（李四龙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4页。

从语义上来说,“人性(humanitas)”指人类“德性(virtue)”的发展,不仅含有现代词语“人文主义(humanity)”的品质要求,如理解(understanding)、仁慈(benevolence)、同情(compassion)、怜悯(mercy),同时还表示刚毅(fortitude)、正义(judgment)、谨慎(prudence)、雄辩(eloquence)、崇尚荣誉(love of honour)等这些更为具体的意涵^①,为“人性”“德性”厘定了具体的约定,使之“有用”而无关“有益”,即能满足当时社会主导逻辑需要的品质被称为“德性”,同时也被认为符合“人性”;除此以外,皆为反“人性”。正合福柯(Micheal Foucault)观点:“人文主义”并非人类的自然财富(natural property)而是历史的构建(historical construction)^②。

尽管西方文化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具有三种内涵^③,但“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ity or human-centredness)”显然更具权威性和正义性。“人类中心主义”首先是对“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积极推崇,如彼特拉克(Petrarch)、阿尔贝蒂(Alberti)提到的伴随智识和道德自治而来的失和感,到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君主论》(The Prince)中体现的不论个人幸福与否,个体经验上共有的英雄主义基调。随之,“人文主义”所强调的人的尊严及个人主义,开始成为西方社会受欢迎的主题。伴随人的尊严而来的是人的潜力、能力及荣誉问题,人文主义运动逐渐从关注人的尊严转向了个人的“有用性”问题:随着能力的提升,人类的雄心已远远超过神力的辖制。到16世纪的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和布鲁诺(Giodano Bruno),“人文主义”反叛了早期对平衡与适度的重视而发展到绝对的“人本主义”,成为后来的“人文主义”的基调,标志性语汇为“积极德性(active virtue)”。到加尔文宗教改革时强调“天职(Beruf)”问题

① “Humanism”.*Encyclopaedia Britannica.Britannica Academic*.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2016.Web.17 Mar.2016.<http://academic.eb.com/EBchecked/topic/275932/humanism>.

② Arcilla, René V.Sand Face: Humanism after Antihumanism.*Educational Theory*.Vol (65). No (6).2015.P656.

③ 笔者按:据《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记述,人文主义的三种内涵非别为古典主义、人文学科以及人类中心主义[humanism should be subject to a wide variety of applications.Of these (excepting the historical movement described above) there are three basic types: humanism as Classicism, humanism as referring to the modern concept of the humanities, and humanism as human-centredness]。请参见“humanism”.*Encyclopaedia Britannica.Britannica Academic*.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2016.Web.17 Mar.2016.<http://academic.eb.com/EBchecked/topic/275932/humanism>.

时，已然形成全民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并以个人在世俗世界中的财力与地位来谋求宗教神性的普遍化社会法则。归根结底，“以人为本”在西方文化框架下，世间的一切资源及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皆以人为中心，为人服务。因而，人的意义内涵也渐变为人的欲望与需求。于是，“上帝死了”之后的“天地万物”不再具有神圣性，人才是世界之主宰。

文化是人与环境互动产生的成果，人是文化的生产者，因而，本课题将汉语语境中的“以人为本”作为衡量文化交流失度的依据。鉴于词义变迁的复杂性与中西意义之间的鸿沟，在此作出界定，以免意涵混淆。

首先，“以人为本”在于善待万物。荀子认为“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这是以人的生命本体为基本的宇宙观，人类因万物滋养而获自身生存并世代相续。敬畏天地万物，是对人自身生命的最大尊重。“以人为本”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程度的重要前提，是对“文化”定义的深化，同时也是构建和谐天人关系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在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以人为本”主张天人和谐生态观，人要自养先养万物，“不涸泽而渔^①”以维持人与环境间的可持续性互动。另一方面，“以人为本”主张对人欲因势利导，合理节欲、导欲和养欲^②，既非“非乐节用”，亦非管子的奢侈经济，社会资源物尽其用，更利保国安民。显然，满足人类自养之需并非意味着过度耗费自然资源。而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过渡到机器大生产时代，机器的无限性弥补了人类的有限性，导致了严重的环境灾难和人类的生存危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廉价商品倾销、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与划分毫无疑问地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企图以一地资源供养世界，甚至通过暴力、政权、垄断等手段为少数人攫取巨额利润，其行为本身虽也为文化交流形式，但与“人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相去甚远。

其次，文化交流中“以人为本”原则在于对生命的尊重。人的生命不仅指肉体，还包括维持肉体健康的系列相关建制，如国家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等。从文化意义上说，尊重别国文化安全是尊重人生命的具体表现。因而，尽管广义的中西文化交流包含了战争作为交流形式，实际上，以灭绝人寰为手段以绝胜负的战争无疑是反人性的。同理，以毒害人的身体而获利的鸦片贸易亦是反人性交流。

最后，文化交流中的“以人为本”在于对生育制度和亲属系统的尊重。中西文化的独特性蕴含于各自的社会组织结构中。生育制度和亲属系统可谓

① 辛铨，《文子》，明子汇本。

② 荀况〔春秋战国〕，《荀子》，清抱经堂丛书本。